

从博弈到共生：“领头雁”何以重构红树林保护与生蚝产业的协同机制？

——以阳东区寿长河国家湿地公园为例

李曼琳

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广东广州

【摘要】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寿长河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作为广东省首个“国字号”河流型湿地公园，其建设与保护是美丽中国建设的生动注解。然而，红树林的生态保护与当地生蚝养殖产业长期存在矛盾：无序蚝排扩张导致河道污染、红树林退化，威胁湿地生态系统完整性。2020 年开始，阳东区人民检察院联合自然资源局、农业农村局以及三个乡镇政府介入，成功破解集体行动困境，实现蚝排整治与生态修复共存。本研究以此为案例，将公共领导力理论有机嵌入 SFIC 模型，环形、动态地分析多方主体协同化解生态保护与产业冲突的治理逻辑。研究发现：检察机关以变革型领导力打破行政分割困境，通过检察建议、联席会议与动态监督整合职能部门及属地政府资源，促成蚝排清拆与合理养殖规划；同时，以“疏堵结合”策略协调民生诉求，推动生态修复与产业可持续发展。本研究为跨域性生态治理提供了“检察监督+行政协同”的创新模式，拓展了公共领导力理论在中国基层治理场景的应用，以期对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产业治理；生态修复；公共领导力理论；SFIC 模型

【收稿日期】2025 年 2 月 15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3 月 14 日

【DOI】10.12208/j.ssr.20250089

From competition to symbiosis: How can the "Leading Goose" reconstruct the synergistic mechanism between mangrove conservation and the oyster industry?

——A case study of Shouchanghe national wetland park in Yangdong district

Manlin Li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Abstract】As the first national-level riverine wetland park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e Shouchanghe Mangrove National Wetland Park in Yangdong District, Yangjiang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serves as a vivid illust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beautiful China. However,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of mangroves has long been in conflict with the local oyster farming industry: the unregulated expansion of oyster rafts has led to river pollution and the degradation of mangroves, threaten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wetland ecosystem. Since 2020, the People's Procuratorate of Yangdong District,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Natural Resources Bureau, th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Affairs Bureau, and the three local town governments, has intervened successfully, resolving the collective action dilemma and achieving the coexistence of oyster raft rectification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This study takes this case as an example, organically embedding the theory of public leadership into the SFIC model to circularly and dynamically analyze the governance logic of multiple stakeholders' collaborative re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industry.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procuratorial organs have broken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dilemma with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integrating the resources of the responsible departments and local governments through procuratorial suggestions, joint meetings, and dynamic supervision, promoting the dismantling of oyster rafts and the formulation of reasonable oyster farming plans; at the same time, they have coordinated the demands of the people with a "combination of guidance and restriction" strategy, promoting ecological

作者简介：李曼琳（2003-）女，汉族，广东潮州人，本科，研究方向：公共政策，乡村振兴，公共服务。

restoration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This study provides an innovative model of "procuratorial supervision + administrative coordination" for cross-region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expand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public leadership in the context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 China, and aims to provide certain reference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Keywords】 Industrial governanc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ublic leadership theory; SFIC model

1 相关背景

寿长河位于广东省阳江市的东南一隅，由 13 种品种构成的红树林面积为 140.45 公顷，加之 415.47 公顷的湿地，坐拥着广东省首个“国字号”河流型湿地公园^[1]。然而，该公园却与沿河两岸村庄的民生有着较大的矛盾。2015 年以来，生蚝市场的需求节节攀高，寿长河的生蚝养殖产业所用的最基本设施——用竹子或木架制成的浮排——蚝排随之快速扩张到无序状态，严重影响沿河的红树林。村民们最重要的生计来源是沿河的生蚝养殖产业，但蚝排会阻碍河水流动，产生的废弃物如蚝壳等不仅破坏河道，还会污染水质^[2]。这导致为保护红树林而需大幅缩减蚝排的规模，又将极大减少村民们的养殖收入，甚至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稳定问题^[3]。而当地政府却难以形成对于无序蚝排的有效治理，出现集体行动困境^[4]。由此，本案例将围绕如何破除集体行动困境以及农村经济与生态保护的矛盾进行探讨。

2 理论基础及分析框架

2.1 公共领导力理论

领导力是指领导者如何带领他人以及激励他人自愿地在组织中做出卓越成就的能力^[5]。由于公共领导力涉及到公共部门领域错综复杂的关系，加之其难以进

行操作测量，相关研究直到 1978 年 Burns 在其著作中引入“交易型领导力”和“变革型领导力”理论才被学界所重视^[6]。进入 21 世纪后，有关公共领导力的研究逐步从宏观概括走向微观挖掘，研究维度向精细化、专业化方向迈进^[7]。

目前，学术界对公共领导力的内涵与结构已形成初步共识，认为公共领导力是“价值”和“能力”的组合^[8]，具体而言是以公共性和公共精神为主导性的核心价值追求，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组织目标的能力^[9]，包括社会意识、社交技巧和知识等方面，体现了公共部门或组织中领导者所具备的领导力^[10]。

结合学者扎根中国情景的研究，本案例将公共领导力划分为变革型领导力、协作型领导力、伦理型领导力、法治型领导力。其中，变革型领导力是指下属受组织使命的感召去自发行动和获得成就的领导力^[11]；协作型领导力是指跨越部门边界将不同的群体和机构组织在一起，以解决复杂的公共问题并实现公共目标的领导力^[12]；伦理型领导力是指领导者用个人行动和人际管理来示范什么是正当的行为，并通过双向沟通和决策制定强化这种行为的领导力^[13]；法治型领导力则是指用法治给行政权力定规矩、划界限，规范行政决策程序，实现制度化和规范化的领导力^[14]。



图 1 公共领导力的四个构成维度^[49]

公共治理的本质是通过规则形成集体行动，公共领导力作为公共治理的核心变量^[15]，对中国乡村地区的集体行动来说十分关键^[16]。一方面，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结构的最基层，基层干部领导和治理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国家政策和资源供给的质量、基层实际问题能否有效解决以及乡村社会治理的成效^[17]；另一方面，公共部门领导者的能力与员工满意度和合作

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8]，公共领导力能够加强政府能力对其服务绩效和公众满意度的影响^[19]。因此需要具有领导能力的基层干部，在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过程中充当有力的“实践者”和“领路人”^[20]。

本案例中，多方面体现公共领导力理论的适用性。审视当前寿长河公共治理困境，其实质不外乎集体行动能力的衰落：在奥尔森“零贡献论”的理论视角下，

集体行动往往会由于受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冲突阻碍，难以增加集体成员的共同利益^[21]；河面等公共资源产权碎片化导致公共事务治理难以形成有规模的合作，村庄公共性逐渐消弭等^[22]，呼唤着基层治理中公共领导力的回归，关注基层干部公共领导力对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与行动路径具有现实的必要性^[23]。通过剖析阳江市阳东区人民检察院（简称阳东区院）发挥公共领导力的路径选择与互动网络，能够丰富公共领导力在中国情境中的理论研究，为基层干部领导能力提升与干部队伍建设、提升乡村治理绩效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2.2 SFIC 模型

日趋复杂的公共事务暴露了单一行政主体应对跨域性、多层级的社会治理问题，协同治理应运而生^[24]。结合总书记对于治理的重要论断与前人研究，本案例认为协同治理是指在多方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共识和合作，共同制定和执行管理决策的过程^[25]。自诞生以来，协同治理历经多次流变，较为经典的有 SFIC 模型。该模型认为协同效果是四个变量发生作用的函数^[26]，每个变量的名称与内涵如图 3 所示，同时每个环节都互相作用，使得整个协同过程为环型而非线型。

SFIC 模型尽管拥有较好的适应修正和应用的潜力，但忽视了外部环境的影响^[27]，缺乏处理现实中各主体矛盾的激励相容规则^[28]，其内部本身偏静态分析，难以解释治理过程的演进，因而缺乏对协同效果的评估和反馈^[29]。故将时间和公共领导力变化引入原模型，探讨推动协同治理发展的过程和机制。

在本案例中，起始条件为利益相关但职务权利、行动所需知识与拥有资源不对称的寿长河区域的自然资

源局、农业农村和水利局（以下简称农水局）、交通运输局以及 P 镇、D 镇、Z 镇这三个乡镇政府，在同等的行政级别下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以及各主体的合作经历，陷入因行政分割而产生的集体行动困境；催化领导则是代表寿长河群众利益的阳东区院运用变革型领导力推动寿长河区域各行政主体开始合作治理河面上的蚝排无序发展问题；制度设计则是阳东区院履行公益诉讼监督职责，以检察建议书和整治动员座谈会的方式推动上述行政主体进行合作；协同过程则是阳东区院在办案过程中多次深入群众面对面释法说理，赢得民众信任，并进行多次“回头看”与持续动态跟进监督，达成合理养殖的共识，最终取得违法养殖蚝排问题得以解决的阶段性成果。

2.3 分析框架

本案例的分析框架由 SFIC 模型与公共领导力有机组成，从协同治理角度来阐述阳东区院如何解决生蚝养殖与红树林保护，即农村经济与国家生态保护问题。阳东区院的领导力是变革型领导力，也是本案例协同治理的领导力。它降低行政分割对于合作治理的负面影响，从而开始推动各行政主体之间的合作。在整合有关行政主体的过程中，而后领导力转化为协作型领导力，确定各行政主体合力治理违法养殖蚝排的目标。随着协同治理的实施，阳东区院联动寿长河红树林管护中心既拆除违法蚝排，又引导蚝排合理养殖，使得领导力转化为伦理型领导力。最后，协同治理的领导力经过法定程序、上级领导与社会大众的认可转化为法制型领导力，并以法定职责的方式成为阳东区院的变革型领导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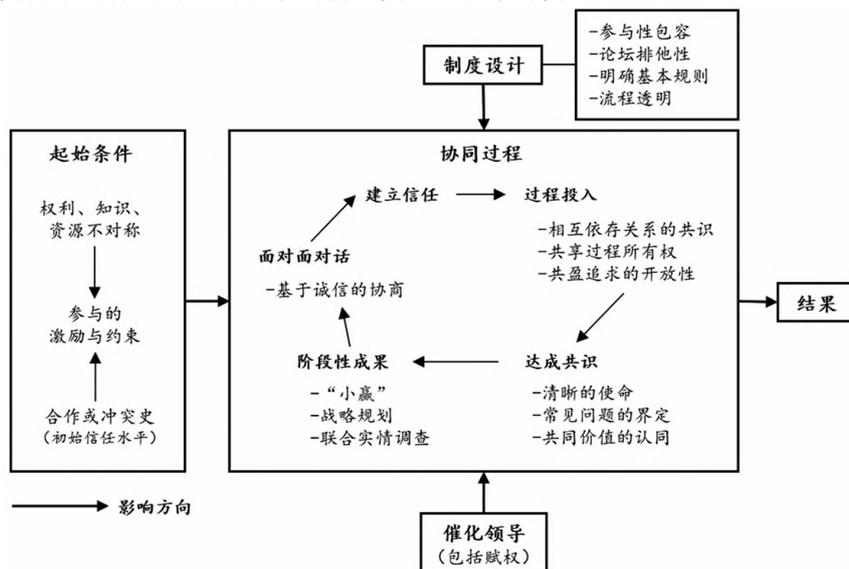


图2 SFIC 初始模型^[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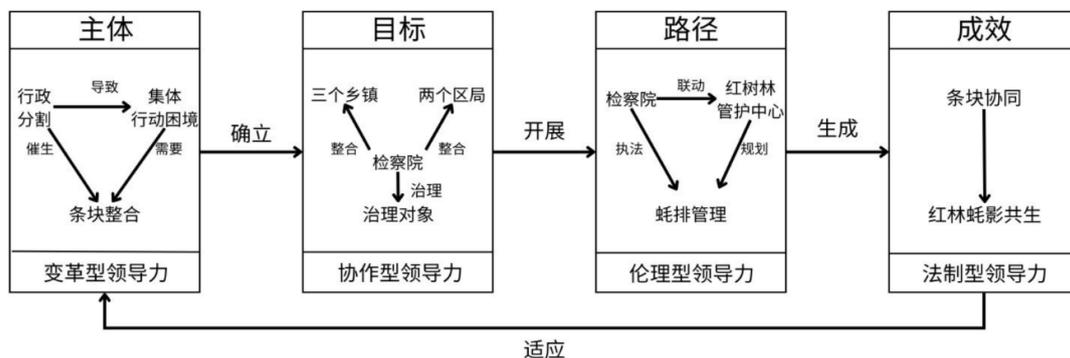


图3 修正后协同治理分析框架（笔者自制）

3 要点分析

3.1 变革型领导力下的分割阶段

得益于寿长河生蚝养殖历史悠久与沿河红树林对于水质净化的作用，阳东寿长蚝成为全国名特优新产品。2015年到2023年生蚝市场规模的复合增长率为6.8%^[30]，市场需求刺激沿河村庄无序扩张蚝排。2020年，自然资源部发布文件，要求“从严管控涉及红树林的人为活动”^[31]，阳东区政府出台的养殖水域滩涂规划文件因而将寿长河中心河道划为禁养区，河面其他部分划为限养区^[32]。

按照文件要求理应清拆河面上的过密蚝排但由于寿长河面属于典型的公共池塘资源，自然资源局、农水局、交通运输局等职能部门与该河流经的三个乡镇在行政分割的情况下难以形成对于无序蚝排的有效治理，陷入“孤岛现象”与合作困境^[33]。这暴露了上述有关行政主体在变革型领导力作用下没有发挥出足够“公共性”的弊端，无法完全满足治理寿长河上无序蚝排的领导力需要^[34]。这种过于看重本部门利益的变革型领导力行为，导致河面上的蚝排以无证、无法、无序的方式快速扩张，不仅严重影响河道通航，还破坏河道生态和红树林湿地保护^[35]。

“大家都养蚝，挤到一块去，争着抢地盘，那么一点地方，连小船都过不了。”（20250117-DG-CJ）

河面上过密的蚝排经常诱使村民们在河面上争夺养殖水域^[36]，进而发生的肢体冲突也多次使得执法部门介入。2020年12月正值生蚝养殖收获的时节，河面上村民们的冲突偶有发生，使得阳东区院对该地区进行日常巡逻，给阳东区院提供了介入的契机。凭借着多次巡逻发现的线索与收集的证据，阳东区院发挥变革型领导力强调远见、创造力与变革精神的积极作用^[37]，通过履行公益诉讼监督职责来推动相关行政单位的协同治理开始成型。

“当时我们看到湿地的景色很漂亮，在远处看很美景，但是近距看就发现密密麻麻的蚝排，在河道中间，非常密集。”（20250116-DC-MLP）

3.2 协作型领导力下的整合阶段

寿长河红树林保护、整治蚝排的生态协同治理始于2020年12月30日阳东区院对承担相关职责的阳东区自然资源局、农水局以及三个乡镇政府等五个行政主体的履行人民检察院应有的监督职责，使得寿长河红树林相关行政主体的集体行动困境开始被打破。具体而言，阳东区院借助无人机勘察定位、调阅相关材料等方式查明从寿长河大桥到寿长河出海口范围的寿长河段内存在着上百个没有办理养殖证和海域使用证的蚝排，使得河流水质和红树林湿地公园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侵害^[39]，因而能够发挥对相关行政主体的监督作用，以外部作用的方式推动寿长河生态协同治理^[40]。

寿长河生态协同治理进一步发展为2021年3月26日阳东区院向上述行政主体依法发出监督建议书。建议书是阳东区院经过三月有余的查阅调取资料，多次实地勘察、收集证据材料工作后，对寿长河红树林相关行政主体依法履行各自职能、联合对寿长河面上无序扩张蚝排进行整治的建议。而这五个行政主体收到建议书后表示的积极履职并按期回复则是阳东区院与相关主体的领导力开始表现为协作型领导力。

“我们收到建议书之后，马上就对现场进行巡查，了解情况。因为寿长河湿地公园是国家级别的公园，禁养区不允许养殖，所以安排到另外海域进行临时安置养殖。”（20250116-DC-HHK）

从公共领导力的视角来看，这是阳东区院的变革型领导力产生的外来监督作用，激活了寿长河流域有关行动单位的变革型领导力，使得阳东区院的变革型领导力蜕变成寿长河红树林协同治理的协作型领导力。其本质上是通过对工作分解将任务压力向下传导的过程，

即为完成中央政策要求的管控任务，阳东区院会具体整合合适的任务给不同的职能部门和属地乡镇政府，从而统筹整合两个职能部门与三个乡镇。在基层政府工作中，科层制会议是压力型体制中政治动员的标志之一^[41]。本团队实地调研发现，阳东区院通过协商会议进行高位推动、制造声势与传达思路，多方位营造情景压力，使得各行政单位能顺势而下地开展工作。在此整合过程中，阳东区院积极履行自身作为协作型领导者角色的职责，建立和维护合作者之间的信任与承诺关系^[42]。

在蚝排清拆整治工作推进的压力场域中，检察院不仅需要面对跨越多个部门的目标任务、督查考核等整合压力，更要回应基层民众的诉求压力，压力的汇合促使条块协同下的寿长河红树林协同治理工作整合并启动。

科层制组织具有“目标具体化”与“结构正式化”的特征^[43]，对科层组织而言，推行工作时一定要明确具体的政策任务、具体执行的人员及具体的资源分配情况，才能保证科层组织在明确的规则和程序下保持高效运转。因此，在行动统筹层面，这种伦理型领导力推动明确政策目标和各部门职责，由自然资源局牵头，农水局等相关部门协同处理该地区的红树林保护修复工作，降低对于如何执行管控的模糊性，压缩相关主体相互推诿的空间。同时，针对可能存在各部门文件相互矛盾的问题和蚝排清拆导致的民生问题也进行相应整改，并将任务层层下达给乡镇政府，对乡镇政府落实蚝排清拆工作施行严格监管。

3.3 伦理型领导力下的行动阶段

寿长河红树林协同治理工作中最为棘手的便是沿河村民们的生计问题。阳江沿海地区有许多民众依赖养殖产业为生，生蚝养殖产业更是某些村子的唯一支柱产业，80%的村民都从事该产业^[44]。由于本地沿河村民世代养蚝为生，又是阳东区拥有红树林面积最大的区域，因此限养与禁养区域的划定导致大量蚝排需要清拆，促使村民们以各种手段反对清拆，造成较为严重的民生问题^[45]。而根据调研发现，市场中商业保险不愿投保，沿河两岸大部分蚝农都是贷款养殖，没有实际保险托底^[46]。无论是极端自然灾害还是蚝排清拆政策的影响，村民们都将面临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损失。同时，蚝排清拆存在历史遗留问题，大部分村民没有办理养殖证和海域使用证的问题从2001年持续到2020年^[47]，秉持着“祖宗海”思想的村民们对于阳东区院等部门的联合行动自然比较反感。当然，阳东区院

在对寿长河收集证据、实地考察时也考虑到贸然拆除蚝排有可能会危害到沿河村民生计与社会稳定，必须妥善处理这一迫切问题。

“完全不让养可能也不符合现实，但是过度养殖会破坏整个红树林和河道的生态。”（20250116-DC-MLP）。

针对这一农村经济与红树林保护的矛盾，2021年4月阳东区院召集上述五个行政主体、寿长河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管护中心和养殖户代表举行整治动员座谈会，商讨寿长河面上的无序蚝排整治问题。在磋商会议中，阳东区院充分考虑现实情况和养殖户需求，力求平衡好行政机关履职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此时的红树林协同治理过程中的协作型领导力开始转化成伦理型行动力。

伦理型领导力具有同情民众和关心民众福祉的精神^[48]，阳东区院充分考虑沿河村民生计需要与村庄发展的现实充分体现这种领导力重视长远目标、注重社会整体的可持续发展的特性。也是在这种领导力的作用与推动下，阳东区院与寿长河领域有关行政主体才没有对禁养区和限养区内的无证蚝排进行“一刀切”式的运动型治理，避免协同治理的组织失败和危机。

最后多方就该问题达成基本共识：禁养区内的蚝排需要村民们在限定时间内进行拆除或转移；限养区内的蚝排密度则由管护中心根据当地水体的生态承载力以及海区自净能力计算出来，并在寿长河端合理利用区等五大区域，为沿河村民高质量发展生蚝养殖产业提供科学指导；至于转移或清拆蚝排带来的村民损失，则由政府和管护中心以培育新产业的思路完善湿地公园基础设施建设，用支持发展湿地观光旅游业以及为寿长蚝等特色农产品提供平台等方式尽可能补偿沿河村庄。阳东区院等主体科学管控养蚝规模与密度，解决好养殖用海历史遗留问题的协同行动深刻体现伦理型领导力对行政主体关注长远利益的驱动作用。

“那几个月检察院的人，经常来我们蚝排考察，也和我们蚝农沟通了很多次。他们非常重视我们蚝农的意见。”（20250117-DG-CJ）

3.4 法治型领导力下的落地阶段

发出检察建议、举行协商会议、达成共识只是检察工作的开始，阳东区院仍持续履行着监管督促职责。2021年11月到2022年7月间，阳东区院多次到现场“回头看”红树林保护情况，并于2022年2月发现寿长河大桥和寿长大桥两座桥梁周边，存在养殖蚝排、船只违法停泊、违法牵拉桥墩等安全问题，故对阳东区交

通运输局也纳入寿长河协同治理过程中，并持续动态跟进监督。

寿长河生态协同治理趋向完善的标志则是2022年2月11日，阳东区院召集上述六个行政单位举行圆桌磋商会议。该会议最终汇聚有关的行政主体整治合作力度，要求把工作做优做实的同时，更要考虑到群众的利益和需求。在此前后，阳东区院在巡视监督过程中深入到沿河村庄群众释法说理，逐步推动将蚝排迁移至生态红线外的可养殖区，这使得部分养殖户主动自行清拆，并对养殖过程中产生的蚝壳等垃圾的合理堆放、清理提出整改意见，体现协同治理中领导者与其利益相关者发生的关系。同时，阳东区院积极争取广东省检察院的领导认可，以期获得对协同治理成果的认可。通过上级领导肯定与沿河村民支持，伦理型领导力得到理性合法的权威架构的承认^[49]，转化为遵守法律规范和相关规章制度的要求以及法治建设的法治型领导力，由此又回到了阳东区院的变革型领导力范畴。

综上，阳东区院通过依法行使法定权利、依法履行职责，做到坚持以法代权、以法压权，从而争取上级领导支持和民众拥护的方式使得上级政府与沿河民众二者达成利益共识，减少有关主体对协同治理过程的负面影响，从而保障协同治理平稳推进，捍卫协同治理的成果，最终促使寿长河生态协同治理的落实。

“在办理这个案件中，与人和自然和谐相处，既要考虑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的权益，又要考虑红树林作为国家生态保护，希望他们在互相保护金山银山的基础之上，处于一种和谐持续合理的发展方向。”

(20250116-DC-MLP)

4 对策建议

4.1 深化公共领导力建设

4.1.1 培养复合型领导人才

镇村干部作为基层治理的核心主体，其公共领导力建构是政策执行效能的关键变量。基于中国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特性，国家需通过制度性干预重塑村庄集体行动的治理逻辑，嵌入熟人社会网络的绩效激励机制^[9]，提高各主体的公共服务动机水平。要求基层干部兼具生态保护法律知识与发展管理经验，并依托“红树林湿地生态公益检察保护实践基地”，联合高校与科研机构开展培训，提升基层干部在生态修复、碳汇交易等领域的决策能力，培养全能复合型领导班子。

4.1.2 推广“服务一适应”型治理模式

政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博弈造成利益失衡，产生政策执行张力^[50]，严重影响红树林保护修复政策的执

行效果。针对养殖户历史遗留问题，采取“疏堵结合”策略。

完善红树林保护红线动态响应机制，加强收集基层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反馈意见，兼顾当地合法合规农业生产设施、渔业港口设施及水利设施的正常维护和使用需求，避免“一刀切”导致红树林保护影响群众生产生活与生命财产安全。

4.2 完善条块协同机制

4.2.1 构建“检察+行政”联动平台

结构包含制度结构和权力结构，其中权力结构是制度得以有效运行的基础^[51]。当前阳东区红树林保护涉及自然资源、环保、水利、农业等多部门，但存在“条块分割”现象。针对检察机关监督乏力问题，需强化“检察建议”的刚性约束，深化“府检联动”工作机制，保障行政检察监督与行政执法监督的有效衔接。建立定期联席会议制度，明确检察机关与自然资源、农业农村、水利等部门的权责边界，形成跨部门执法清单。参照广东省林业局与自然资源厅联合印发的《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将红树林保护指标纳入地方林长制考核体系。

4.2.2 市场主体与公众参与双向赋能

建立市场主导的跨区域生态资源定价与交易机制^[52]，推动碳排放权、水权、林权等要素的标准化交易，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53]，降低制度性交易壁垒，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加强社会舆论监督，完善环境政策听证会、社区协商议事会等程序，赋予公众在规划环评、生态修复项目中的知情权与表决权，对违反环保法规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揭发，明确公众对环境违法行为的诉讼主体资格，探索环境公益诉讼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生态治理的良好氛围，推进打造社区共管的红树林湿地国家公园^[54]。

参考文献

- [1] 何翰林,罗金龙,卢立,等.广东阳东寿长河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植物多样性研究[J].中南林业调查规划,2020, 39(03): 42-46.
- [2] 张龙,刘玉,文敏,等.以海口河流为主体水域的国家湿地公园水资源保护——以广东阳东寿长河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为例[J].中南林业调查规划,2024,43(01):17-20.
- [3] 何翰林,刘嘉炜,但新球,等.广东阳东寿长河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社区关系与共管的主要实践途径探讨[J].中南

- 林业调查规划,2020,39(04):22-26.
- [4] 李正升.从行政分割到协同治理:我国流域水污染治理机制创新[J].学术探索,2014,(09):57-61.
- [5] Kouzes J M, Posner B Z. The leadership challenge[M]. John Wiley & Sons, 2006.
- [6] Latour B. 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7] 曾建国,王迦南.西方公共部门领导力研究述评[J].领导科学,2019,(02):46-50.
- [8] Wallis J, Gregory R. Leadership, accountability and public value: Resolving a problem in “new governance”?[J]. Int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09, 32(3-4): 250-273.
- [9] 王亚华,舒全峰.双管齐下提升乡镇政府公共领导力[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7,(04):26-30.
- [10] 舒全峰,苏毅清,张明慧,等.第一书记、公共领导力与村庄集体行动——基于 CIRS “百村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18,15(03):51-65+156.
- [11] Bass B M. Theory of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redux[J].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1995, 6(4): 463-478:463-479.
- [12] Crosby B C, Bryson J M. Integrative leadership and the cre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cross-sector collaborations[J].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2010, 21(2): 211-230.
- [13] Brown M E, Treviño L K, Harrison D A. Ethical leadership: A social learning perspective for construct development and testing[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2005, 97(2): 117-134.
- [14] 俞可平.中国的治理改革(1978-2018)[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71(03):48-59.
- [15] Ostrom E. Public entrepreneurship: a case study in ground water basin management[EB/OL].[2009-07-31]<https://dlib.indiana.edu/dlc/handle/10535/3581>.
- [16] Ostrom E. Coping with tragedies of the commons[J].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9, 2(1): 493-535.
- [17] 王亚华,高瑞,孟庆国.中国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危机与响应[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31(02): 23-29+195.
- [18] Cho Y J, Lee J W. Perceived trustworthiness of supervisors, employee satisfaction and cooperation[J].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2011, 13(7): 941-965.
- [19] Andrews R, Boyne G A. Capacity,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Testing the black box model of public management[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10, 70(3): 443-454.
- [20] 袁明旭.新时代村干部群体特征及其对乡村治理的影响[J].人民论坛,2022,(05):50-53.
- [21] Ostrom E. Collective ac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norms[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0, 14(3): 137-158.
- [22] 贾海彦.第一书记、福利刚性与贫困乡村治理之路——基于生态脆弱区的案例调研[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20,19(06):745-752.
- [23] 王亚华,舒全峰.中国乡村治理中的领导力与公共服务动机[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9,8(05):23-31.
- [24] Kirk Emerson, Tina Nabatchi, Stephen Balogh.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fo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J-PART,2012,22(1):1-29.
- [25] 孙大鹏.协同治理的理论框架及案例考察[J].财经问题研究,2022,(08):113-121.
- [26] 朱志伟.长三角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协同治理与范式创新[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 45(01):33-43.
- [27] 柴茂,刘璇.跨域水污染协同治理 SFIC 修正模型研究——来自太湖流域的证据[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7(01):98-105.
- [28] Ostrom E .A General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Sustainability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J]. Science, 2009, 325(5939):419422.
- [29] 陈桂生,徐铭辰.数字乡村协同建设研究:基于 SFIC 模型的分析[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 2022,(01):138-147.
- [30] 智研咨询:《生蚝》,智研产业百科,<https://www.chyxx.com/wiki/1184279.html>,2025年2月19日.
- [31] 自然资源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2025年)》的通知(自然资发[2020]135号)[J].自然资源通讯,2020(16):11-16.
- [32] 阳江市阳东区人民政府:《阳江市阳东区养殖水域滩涂

- 规划(2018—2030年)》,阳东区人民政府网,http://www.yangdong.gov.cn/gkmlpt/content/0/413/post_413632.html#1027,2025年2月19日。
- [33] 吴少微,杨忠.中国情境下的政策执行问题研究[J].管理世界,2017,(02):85-96.
- [34] Price T L. Explaining ethical failures of leadership[J]. *Leadership &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Journal*, 2000, 21(4): 177-184.
- [35] 方伟彬,岳检宣:《广东阳东:检察蓝守护下 红树林和“寿长蚝”良性共存》,中国新闻网,<https://www.chinanews.com.cn/sh/2023/03-15/9972019.shtml>,2025年2月19日。
- [36] 周昌仕,侯晓梅,杨菁,等.广东西部沿海地区牡蛎产业发展策略研究——基于养殖户、企业和政府部门的深度访谈[J].广东农业科学,2015,42(14):155-162.
- [37] 任俊颖.面向政府治理变革的领导力提升路径研究[J].领导科学,2021,(12):36-39.
- [38] 刘菁菲.变革型领导理论对提高政府管理效能的影响分析[J].当代经济,2016,(08):27-29.
- [39] 秦天宝,刘斯羽.环境公益诉讼纳入国际环境公约履约体系的路径研究[J].人权法学,2023,2(05):32-48+143-144.
- [40] Schwarz G, Eva N, Newman A. Can public leadership increase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and job performance?[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20, 80(4): 543-554.
- [41] 常健,刘明秋.基层政府的会议内容与形式及其匹配关系研究——基于对三个不同地区县政府的调研[J].学习论坛,2019(02):43-47.
- [42] Morse R S. Integrative public leadership: Catalyzing collaboration to create public value[J].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2010, 21(2): 231-245.
- [43] 斯科特,戴维斯.组织理论:理性,自然与开放系统的视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33.
- [44] 林晓.生蚝 珍藏海水的滋味[J].中国国家地理, 2020(12):168-179.
- [45] 龚志文.运动式政策参与:公民与政府的理性互动——基于广州番禺反焚运动的分析[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6(01):50-59.
- [46] 党雪,石慧,徐浩,等.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强国建设背景下巨灾商业保险发展研究——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实践[J].西南金融,2024(02):89-100.
- [47] 韩杨.1949年以来中国海洋渔业资源治理与政策调整[J].中国农村经济,2018,(09):14-28.
- [48] Eisenbeiss S A. Re-thinking ethical leadership: An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ve approach[J].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2012, 23(5): 791-808.
- [49] 白洁,李秀峰.公共领导力:概念界定与构成维度——基于领导力理论与中国情境的探索[J].党政研究,2021,(05):101-109.
- [50] 徐小丰,陈世香.社会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多重制度逻辑冲突与行动策略——以 T 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为例[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 63(02):118-128.
- [51] SHAPIRO I,SKOWRONEK S,GALVIN D.Rethinking political institutions:the art of the state[M].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6:32.
- [52] 王家庭,曹清峰.京津冀区域生态协同治理:由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引申[J].改革,2014,(05):116-123.
- [53] Sikor T, He J U N, Lestrelin G. Property rights regim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a conceptual analysis revisited[J]. *World Development*, 2017, 93: 337-349.
- [54] 王昌海,谢梦玲.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治理:历程、挑战以及体系优化[J].中国农村经济,2023,(05): 139-162.
- [55] Ansell C, Gash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008, 18(4): 543-571.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